学术专论

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在青海的退缩与归宿

——从二世噶勒丹锡呼图身世说起

呼 和

[摘要] 二世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系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对雍乾两朝政教事务影响深远。其父额尔克卫征，是青海蒙藏诸部共奉上师三世察罕诺们汗之兄长。本文首次考出，罗布桑丹毕尼玛家族实为明朝中期入据西海的土默特蒙古后裔。土默特蒙古在统治西海时期的驻牧地为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17世纪前半叶，和硕特蒙古迁入青藏高原，土默特蒙古受其制约，以致势力退缩。然而，18世纪初，该家族再度活跃，尤其三世察罕诺们汗凭借宗教地位及其在罗卜藏丹津事件中的政治立场，深受清廷垂赏。1725年，清廷在青海推行盟旗制度，授予其独立一旗，史称察罕诺们汗扎萨克喇嘛旗。这一历史变迁，展现了青海土默特蒙古自入清以来的历史归宿。

[关键词] 二世噶勒丹锡呼图 三世察罕诺们汗 额尔克卫征 青海土默特蒙古

[**中图分类号**] K249.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2－0150－010

明朝嘉靖年间，鄂尔多斯蒙古首领衮必力克济农与土默特蒙古俺答展开对西海[①]地区的征伐，历经三十余年的征战，逐步确立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土默特蒙古驻牧于黄河南岸的捏工、莽剌二川，成为西海主要势力之一。1632年，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占领西海，但不久，1636年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用兵青藏高原，击退喀尔喀蒙古等势力。固始汗将捏工川赏予土默特蒙古贵族出身的二世察罕诺们汗·罗垒扎木苏，使其家族得以重返原驻牧地。

本文探讨的罗布桑丹毕尼玛（1689—1762），正是降生于捏工川。由于捏工、莽剌二川接近和硕特蒙古的驻牧地，加之其父拥有台吉头衔，导致部分学者误认为罗布桑丹毕尼玛是和硕特蒙古后裔。本文通过考察罗布桑丹毕尼玛之父额尔克卫征及其叔父三世察罕诺们汗的身份，证实了该家族为土默特蒙古的史实，并结合相关史料，揭示出在清初和硕特蒙古控制青海地区时期，土默特蒙古所面临的严峻处境，以及随着清朝统治的强化，其最终的历史归宿。

[**收稿日期**] 2024-06-11

[**作者简介**] 呼和（1991— ），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huhe298@ruc.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306360121）阶段性成果。

① 即今日青海地区，明朝称西海，清朝称青海。

一、二世噶勒丹锡呼图的身世谜团

关于罗布桑丹毕尼玛的身世，前人论著有所涉及，但未有专论。日本学者若松宽曾利用《脱思麻教法史·史海》和相关传记史料研究过清代历辈察罕诺们汗与噶勒丹锡呼图，指出："罗桑丹白尼玛之父是卫征台吉，其父之弟是察罕诺门罕堪钦仁青（大堪布宝），母名洛莫吉。"① 另外，他在《察罕诺们汗事迹》一文中探讨历世察罕诺们汗，推测其先世，认为："察罕诺们汗之兄拥有台吉称号，不难肯定诺们汗为青海蒙古人。"② 在国内学者中，罗布桑较早关注过蒙古族高僧所著藏文作品，他著有《蒙医渊源》一书，该书提到："罗布桑丹毕尼玛是青海省右翼黄河岸边的杨桑地方人，第12绕迴戊巳年（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降生于察罕诺们汗之兄孛尔只斤氏额尔克台吉和鲁木吉家里。"③ 不过罗布桑并没有记载史料出处，因此这一观点的论据待考。蒲文成译注《七世达赖喇嘛传》时，对罗布桑丹毕尼玛的身世作了简短介绍，认为"罗桑丹毕尼玛系三世察罕诺们汗之兄额尔沁台吉之子，蒙古族"，④ 但亦未写明利用了何种史料。罗布桑策仁所著《葛尔丹锡勒图葛根和他的徒弟们》一书提到："洛桑丹毕尼玛，在清朝康熙二十八年降生于青海右翼黄河岸边杨桑之地，其身世为台吉身份的蒙古家庭。"⑤ 陈庆英、马连龙译有《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其中对二世噶勒丹锡呼图的身世亦有些许探讨，认为："洛桑丹贝尼玛（公元1689—1762年），为和硕特蒙古卫津台吉之子。"⑥ 遗憾的是，上述学者都未说明史料出处。

迄今为止，学界对罗布桑丹毕尼玛的身世有所关注，但仅在研究其生平事迹之时顺带涉及，尚无专论。这更是从旁说明了罗布桑丹毕尼玛身世研究的难度。其一，《安多政教史》《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重要史料均未记载罗布桑丹毕尼玛的父亲卫征台吉。卫征或许并非人名，而是一种名号。⑦ 其二，三世察罕诺们汗的传记至今未被发现，是相关研究的遗憾。《夏茸尕布传》⑧ 亦未能明确三世察罕诺们汗的身世。鉴于三世察罕诺们汗是罗布桑丹毕尼玛的叔父之实，考出其二人的任何一位，便可澄清罗布桑丹毕尼玛的族属。其三，尽管七世达赖喇嘛于1746年所撰《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传》⑨ 载及罗布桑丹毕尼玛的降生地、父亲、叔父等信息，但仅此而已。由于三世察罕诺们汗是七世达赖喇嘛的出家经师，因此七世达赖喇嘛在该传中更加注重并强调自己的经师，而对他们族属的记载存在缺漏。由于以上原因，长期以来，罗布桑丹毕尼玛的身世问题，鲜为人知，悬而未决。甚至，明末清初青海地区的权力格局和民族分布的巨大变化，尤其和硕特蒙古的历史影响，使得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家族是和硕特蒙古后裔。

---

①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马大正等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②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284页。

③ 罗布桑、乌仁图雅:《蒙医渊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④ 原文内容：赤钦之化身罗桑丹贝尼玛（1689—1762），系七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时的经师三世察罕诺们汗阿旺罗桑丹贝坚赞（1660—1728）之兄额尔沁台吉之子，蒙古族，青海人，为青海德钦寺主要活佛之一，清代驻京呼图克图，在京驻福祥寺，其系统因是甘丹赤巴的转世，故通称"赛赤"，意为金座。参见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⑤ 罗布桑策仁:《葛尔丹锡勒图葛根和他的徒弟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⑥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⑦ 拥有"卫征"名号的有厄鲁特人卫征达日罕昂素、喀尔喀马喀答哈屯卫征阿克、喀尔喀额尔德尼卫征诺颜博第松等人，参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下册，陈庆英、马连龙、马琳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吴元丰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6、502页。

⑧ 德布·陈列奥赛:《夏茸尕布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8页。按，该书的史料价值有限，有许多与史实不符的记载。

⑨ 赛赤洛桑丹贝尼玛:《赛赤洛桑丹贝尼玛文集》第1册，青海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二、罗布桑丹毕尼玛的父辈“卫征台吉”与“阿其图诺门罕”的身份

前已述及，有关罗布桑丹毕尼玛的父亲卫征台吉，“卫征”应为一种名号，而台吉是蒙古贵族的爵位名号，因此，参考罗布桑的“额尔克”说和蒲文成的“额尔沁”说，并结合《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传》《五世达赖喇嘛传》等史料，可细究这一家族的族属。关于罗布桑丹毕尼玛的降生地、父亲等信息，《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传》如下记载：

> 复次，尊者诞生之地则，（地处）犹如蓝天滴洒在大地般的万流王湖（青海湖）之西，为芒隅沙漠之部分的东山罗刹山脉向右弯曲之地，南方为萨隆山，西方为白峰山脉，北方则以黄河而闻名的大河悠然而过，即此以众祥瑞围绕之地，犹如天界乐园般的杨桑之地。在此地，我（七世达赖喇嘛——译者）的堪钦仁波切以阿旺罗桑丹毕坚赞贝桑布而闻名的察罕诺们汗，他兄弟二人，兄长叫卫征台吉，其妻叫鲁母吉，土蛇年蒙古历初月四大吉之日，（尊者）作为二人之子，具此具圆满血统之子降生于堪钦至尊上师所降生之宫帐内。①

从这段史料可知，罗布桑丹毕尼玛降生于杨桑地方，其父亲是卫征台吉，叔父为三世察罕诺们汗·阿旺罗桑丹毕坚赞。罗布桑和蒲文成二位学者掌握的信息，除了罗布桑丹毕尼玛的出生地和父母名字之外，从中还可知这一家族中有著名格鲁派高僧三世察罕诺们汗。有关卫征台吉的名字，出现于《五世达赖喇嘛传》1678 年事迹中，据载：

> （五世达赖喇嘛）会见了从青海来的额尔德尼和硕其的使者席热巴图尔、墨尔根台吉的使者曲嘉措、额尔克卫征的夫人、雄索沃巴格隆嘉央、本塘喀巴兰青等，我为九位首领等人做了加持，为三百余名民众撒花祝福。②

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额尔克卫征是罗布桑丹毕尼玛之父。而墨尔根台吉则是和硕特汗廷固始汗之裔。③ 基于以上信息，不难发现，额尔克卫征与和硕特汗廷关系密切，甚至可能自身亦属和硕特蒙古。然而，额尔克卫征家族居住于青海蒙古右翼，其是否为和硕特蒙古尚存疑问。此外，罗布桑“额尔克”之说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世袭中确实有和额尔克卫征相同名字之人，此人是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的孙子岱青巴图尔之长子额力克岱青，更需注意的是，额力克岱青的胞弟是阿其图诺门罕（三世察罕诺们汗获有该名号），这亦符合卫征台吉与三世察罕诺们汗的长次顺序。而固始汗第六子多尔济达赖洪台吉的三子达颜墨尔根岱青的孙子之名和额尔克卫征的名字亦有相同之处，即额尔克台吉巴勒多尔济。不过额尔克台吉巴勒多尔济因早逝，且无胞弟，故可排除卫征台吉为固始汗第六子后裔的可能性。④

我们需要以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世袭为主要线索，进行分析。据《安多政教史》和《松巴佛教史》等记载，和硕特汗廷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的次子博硕克图济农有四子。其长子岱青巴图尔有三子，长子为额力克岱青（额克岱青）、⑤ 次子为敦多布、三子为阿其图诺门罕。罗布桑的观点与博硕克图济农长子岱青巴图尔的世袭最为接近。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后，其第五子伊勒都齐的次子博硕克图济农掌管了青海蒙古右翼。因此，既往研究将罗布桑丹毕尼玛的身世

① 赛赤洛桑丹贝尼玛：《赛赤洛桑丹贝尼玛文集》第 1 册，第 38 页。上引内容由笔者翻译。

②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下册，第 280 页。

③ 墨尔根台吉为固始汗第二子鄂木布（又称阿杂拉洪台吉）之次子，详见宝音德力根等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册，第 260 页。

④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年，575 页。

⑤ 岱青巴图尔的长子藏文书写成 ir khe ta’i ching，即额尔克岱青。详见益西班觉：《松巴佛教史》，第 624 页；另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47 页。

与和硕特汗廷，尤其与博硕克图济农世袭联系起来不无道理。我们将以往研究的观点与《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传》和相关史料进行比对，可见：一、罗布桑丹毕尼玛的父亲额尔克卫征拥有台吉爵位，可确定其族属是居住于青海地区的某个蒙古部落，这与和硕特蒙古的身份相吻合。二、“岱青”和“卫征”[①] 均为蒙古贵族常见的名号，并且在当时获有二种名号的蒙古贵族不以为奇。因此可将额尔克岱青和额尔克卫征视为同一个人，也就是说，罗布桑丹毕尼玛的父亲名为额尔克，而惯称为额尔克台吉、额尔克岱青、额尔克卫征、卫征台吉等。三、在当时，察罕诺们汗拥有“阿其图诺门罕”名号，因此，将岱青巴图尔三子阿其图诺门罕视作察罕诺们汗亦有一定依据。四、岱青巴图尔三子中额尔克岱青（台吉）为兄长，阿其图诺门罕为胞弟，这也符合二人长次顺序。这样看来，将罗布桑丹毕尼玛的先世视作和硕特蒙古似乎很合理，将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的世袭视作罗布桑的论据，貌似符合历史真相。对此，若只停留在文本记载层面，此观点有一定的参考性。然而，岱青巴图尔第三子阿其图诺门罕果真是三世察罕诺们汗吗？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这一拥有“阿其图诺门罕”名号者的身份，首先需要明确。因为，在这一时期获有“阿其图诺门罕”名号的高僧至少有三。其一，三世察罕诺们汗·阿旺罗桑丹毕坚赞获有该名号。《安多政教史》载：“阿旺洛桑丹白坚参担任七世达赖喇嘛遍知者噶桑嘉措出家的堪布，并给七世达赖授灌顶、教敕。因此被赐封‘阿齐图欧凑更察罕诺门汗’的名号。”[②] 才让认为：“阿旺洛桑丹白坚参，康熙五十六年出任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出家堪布。是年，康熙帝赐封给‘阿其图欧凑更察罕诺门汗’的名号，察罕诺们汗喇嘛名号自此始。”[③] 另有学者称：“1692 年，第巴桑杰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向三世察罕诺门罕授予‘阿其图额茨格察罕诺们罕’名号。”[④] 其二，堪布诺门罕，名车臣图达赖喀木布或罗桑东珠。《塔尔寺志》称“嘉堪布·阿齐图诺门罕·罗桑邓珠（善慧义成）”。[⑤] 扎扎认为：他的“阿其图”名号似由达赖七世所赐。[⑥] 不过堪布诺门罕何时有这一名号还难以确考。根据《七世达赖喇嘛传》火阳猴年（1716）的事迹中记载，“此时，塔尔寺原任堪布（即法台）辞职，需由新堪布接替，向喇嘛禀告。喇嘛经过思考审查，委任阿齐图诺门罕为堪布，众皆满意”。[⑦] 由此可知，堪布诺门罕获这一名号的年份不晚于 1716 年。其三，札什伦布寺的法座阿旺曲丹。《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传》记载：“众成就者之顶饰，具恩德法台仁波切阿其图诺门罕·阿旺曲丹。”[⑧] 对于阿旺曲丹何时获有“阿其图诺门汗”封号，《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云：“皇帝为表彰达赖经师堪钦阿旺曲丹服侍达赖喇嘛的功绩，封为‘显明黄教阿齐图诺门汗’。”[⑨] 阿旺曲丹是第 54 任甘丹赤巴，亦曾担任过七世达赖喇嘛的经师。

那么博硕克图济农长子岱青巴图尔三子“阿其图诺门罕”究竟是谁呢？有关这一问题，扎扎和王力二位学者曾有考证。前者根据相关史料对堪布诺门罕的身份进行了研究，认为：“堪布诺门罕，蒙古族，系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支系后裔。”[⑩] 而后者的研究更具说服力，他根据

---

① 如拥有“岱青”名号的就有青海和硕特人罗卜藏达尔扎、青海准噶尔人色布腾扎勒等。详见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570、583 页。

②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第 258 页。

③ 才让：《青海厄鲁特蒙古各部传承和扎萨克世袭》，《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

④ 仁青卓玛：《第五世达赖喇嘛授予三世察罕诺们汗之铁卷文书考》，《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⑤ 色多·罗桑崔臣嘉措：《塔尔寺志》，郭和卿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9 页。

⑥ 扎扎：《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王族高僧堪布诺门罕考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⑦ 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第 28 页。

⑧ 赛赤洛桑丹贝尼玛：《赛赤洛桑丹贝尼玛文集》第 1 卷，第 62–63 页。

⑨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 61 页。

⑩ 扎扎：《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王族高僧堪布诺门罕考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五世达赖喇嘛传》和《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等史料，进一步明确堪布诺门罕的身份，即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的后裔。[①]

关于堪布诺门罕（阿其图诺门罕）的名字，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扎扎认为是“堪布诺门罕·罗桑东珠”。其二：才让认为：“岱青巴图尔有子三，长阿喇布坦扎木素，次惇多布鄂木布，三子车臣固（图）达赖喀木布，出家为僧，班禅赐法号恰奇图诺门罕，汉文史料称堪布诺门罕，是住塔尔寺的堪布喇嘛。”[②] 堪布诺门罕除了拥有“阿其图诺门罕”名号外，还拥有“达赖诺门罕”[③] 之名号。另一个名字罗桑东珠，或许是其出家法名？目前还不能确知。

另据相关史料可知，混淆察罕诺们汗和堪布诺门罕二者身份的记载亦有不少。如：魏源《圣武记》记载：“青海大喇嘛曰察罕诺们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尔寺，为黄教之宗，番夷信向，丹津以术诱煽使从记。”[④] 王力将这里的察罕诺们汗更正为堪布诺门罕。[⑤] 而清前期大将军年羹尧的《奏闻罗卜藏丹津同党来降折》中，将卷入察罕丹津事件的喇嘛确认为堪布诺们汗，[⑥] 即岱青巴图尔的第三子车臣图达赖喀木布。年羹尧的奏折是“遗留性史料”，[⑦] 因此更具可信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澄清的是，岱青巴图尔第三子阿其图诺门罕是塔尔寺的堪布诺门罕，名为车臣图达赖喀木布或罗桑东珠，而不是三世察罕诺们汗。继而可知，罗布桑丹毕尼玛的族属并不是和硕特蒙古。罗布桑的观点或许以和硕特蒙古系谱为主要依据，进而找出相同名字之人。因为，罗布桑丹毕尼玛降生于青海右翼蒙古，并且其父拥有台吉头衔，这完全符合和硕特蒙古贵族的身份和其统治辖地。不过，罗布桑没有给出史料出处，因此很难明了其依据的具体史料。另外，蒲文成的“额尔沁”说在相关史书中均不见记载，这一观点的可靠性存疑。[⑧]

三、捏工、莽剌二川的统治者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捏工、莽剌二川地区经历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多次角逐和更迭。这一地区不仅有优于海西和海北地区的丰茂水草资源，还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提供防御优势。永谢布、土默特蒙古等部落先后将这一地区视为重要的根据地。此地便是罗布桑丹毕尼玛的降生地。

明朝中期，蒙古右翼永谢布首领亦卜剌、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赉阿哈剌忽率部南下，于正德五年（1510）迁移至明甘肃边外，最后在西海地区驻牧下来。嘉靖十一年（1532），衮必力克济农与俺答的势力开始攻入西海，袭破亦卜剌营，收其部落大半。自此至隆庆（1567—1572）年间近 30 余年的征战，土默特部逐步控制了西海地区，“丙兔台吉、把尔户台吉、多罗土蛮火落赤等人先后成为西海蒙古中最有实力的领主”。[⑨] 另外，“在万历十六年（1588 年），火落赤等移牧于黄河以南，自此开始飞扬跋扈于河州、洮州之间。在茫拉曲、仁贡地区，火落赤是特别将仁贡（捏工）作为根据地的。”[⑩] 李文实认为：“榆谷、一公、捏工、热贡古今音读差异不大。

---

① 王力：《察汗诺门罕述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② 才让：《青海厄鲁特蒙古各部传承和扎萨克世袭》，《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需注意的是，才让将“车臣图达赖喀木布”的“图”字错抄为“固”了。“车臣图”是蒙古文“Sečentü”的音译，意为：“聪明的、聪颖的”。因此，堪布诺门罕的名字应为车臣图达赖，喀木布即堪布之意。

③ 王力：《察汗诺门罕述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④ 魏源：《圣武记》卷 3，岳麓书社，2004 年，第 135 页。

⑤ 王力：《察汗诺门罕述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⑥ 张羽新、张双志主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第 40 册，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 64 页。

⑦ 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的相关史料为例》，《清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⑧ 另外，部分民间学者亦认为罗布桑丹毕尼玛的父亲名为“额尔沁”，史料来源不得而知。由于这些学者没有公开发表相关文章，笔者在撰写过程中没有展开讨论。

⑨ 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72 页。

⑩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 152 页。

这给我们一个即语言探求古地的所在，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子。”① 可见热贡、捏工是相同之地。李文实依据相关史料，对明朝时期的捏工川做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明代地图的捏工川，即指包括今甘南黄河西部甘家滩和循化县全境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泽库、河南、尖扎四县地，与其西的莽剌川相接。大榆谷以今同仁、泽库为中心。小榆谷则即今夏河甘家滩地带，历史上今甘南州夏河属西宁道和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在区划上与热贡地区联成一体。”② 由此可知，现今青海省贵德县、尖扎县等地是当时土默特蒙古的主要驻牧地。

1632 年，喀尔喀蒙古却图汗率军攻入青海，面临的强敌是土默特蒙古。《第巴法王传》记载，第巴活佛曾亲眼目睹了双方交战：“水猴年（1632）却图汗的军队消灭了所有土默特部，此尊者师徒从火枪和箭如雨般射出的战场中逃离。”③ 从此却图汗占领了土默特蒙古的驻牧地。战败的土默特部之火落赤余部徙居丹木科合，“丹木科合大约是指从结古（即玉树 Yosus）到其西面的纳哈暑间的地区”。④《先祖言教》云：“遭到却图汗侵害的土默特部，曾占据了绒域的许多地区，其中分出洮河流域的土默特部，与此方共居，占据阿木却乎方面的土地。”⑤1636 年，跟随和硕特蒙古攻入青海地区的步伐，土默特蒙古不久又复归于原驻牧地。固始汗灭却图汗并统治青海地区后，“作为寺属领地奉献罗赖扎木苏的隆地，位于保安河流域。该河中游被称为捏工”。⑥ 罗赖扎木苏即二世察罕诺们汗，是土默特蒙古首领火落赤之子。实际上，土默特部能够复归故地，是经固始汗允许的。这亦说明，固始汗对格鲁派高僧的优待与重视。若松宽认为：“火落赤的名字再次出现于 1646 年在绒地区发生的事件中，这件事表示他已经能够复归于黄河以南的故地。”⑦ 不过，火落赤卒于 1615 年，该火落赤并非他本人，应为他的后裔。⑧ 可见，土默特部复归原驻牧地，并恢复原先捏工、莽剌二川的统治权是符合史实的。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次子博硕克图济农进入土默特部故地（1675 年）之前，“黄河以南康区只有蒙古土默特之火落赤部人，并以人口稀少水草丰美著称。博硕克图济农曾经被土默特人以肥美的羊肉款待过，随后率领部众渡过黄河抵达巴水和泽曲河流域”。⑨ 由此可知，土默特部复归故地之后，仍是捏工、莽剌地区的领主，并与和硕特蒙古保持着密切关系。⑩

三世察罕诺们汗和罗布桑丹毕尼玛的降生地均为杨桑（约在今青海省尖扎县马可唐地区）。关于三世察罕诺们汗的降生地，《安多政教史》有详细的记载，据载：“森宝山下的曲察阳桑村，亦称玛克塘村”，⑪ 他降生于 1660 年，该地属于土默特蒙古的统治区域捏工川区域。其兄额尔克卫征拥有台吉爵位，很显然这一家族应为土默特蒙古贵族，罗布桑丹毕尼玛自然亦是土默特蒙古之裔。

这一时期的莽剌川是三世察罕诺们汗的主要驻锡地之一，他将幕舍建于此地。《先祖言教》载：“拉茂夏茸阿旺丹贝坚赞期间，额尔盖王府将艾尔克、巴然、夏库玛、亚斡尔等四个‘达’

---

① 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8 页。

② 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第 87–88 页。

③ 才让：《〈第巴法王传〉所载明末蒙藏民族关系史考述》，《中国藏学》2023 年第 3 期。

④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 150–151 页。

⑤ 仲优 · 昂青嘉布著，香札 · 尕布藏确吉坚赞整理：《先祖言教》，多杰仁青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86 页。

⑥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 281 页。

⑦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 161 页。

⑧ 火落赤的名字在 1714 年的史料中亦出现，这或许是一种尊号。详见第二世嘉木样 · 久美旺波：《第一世嘉木样传》，杨世宏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48 页。

⑨ 李保文：《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甘青川地区蒙古俺达汗后裔》，《四川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⑩ 另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三月，阿喇布坦等至察罕托罗海，察罕诺们汗迎告曰：‘皇上令青海众得享安乐，永受恩泽，何幸如之。’” 这亦表明，三世察罕诺们汗与和硕特蒙古上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详见包文汉、奇 · 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556 页。

⑪ 智观巴 · 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第 257 页。

作为部众之份赠送给他，并划拨了芒拉、夏雄地区，从此确定巴地的仔托尕哲和多拉拉青作为亲王与他的草场界限。”[①] 另据《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传》记载：“木羊年（1715 年），金刚总持怙主叔侄二人将我迎请至位于莽剌的帐前。”[②] 上述史料所指叔侄二人便是三世察罕诺们汗和罗布桑丹毕尼玛。1715 年，其二人迎请七世达赖喇嘛至莽剌川幕舍。可见莽剌川是三世察罕诺们汗的辖地。由此可知，1675 年和硕特蒙古进入土默特蒙古驻牧地后，莽剌川仍归三世察罕诺们汗。这能够反映，和硕特蒙古在青海建立统治后，对该家族的优待与其对格鲁派的扶持密切相关。自固始汗以来，和硕特蒙古上层高度重视并扶持格鲁派，推进了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

四、额尔克卫征的遭遇及土默特蒙古势力的退缩

学界对明末清初青海地区历史多有关注，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自和硕特汗廷控制青海到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的 80 余年的历史，仍有进一步探究空间。正如本文所关注的和硕特蒙古对居住在青海地区的其他蒙古部落的态度以及管理措施的研究，目前十分薄弱。自 1675 年博硕克图济农进入土默特蒙古驻牧地之后，可能采取了某种特定方式同土默特蒙古进行互动。李保文以土默特蒙古楚呼尔台吉事件为例，分析了土默特蒙古的遭遇，指出：“博硕克图济农将楚呼尔台吉等属民之大部 700 余户据为己有，给他们留下了 280 余户的口粮没有把他们斩草除根，看来土默特部楚呼尔台吉与博硕克图济农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③] 据此可知，和硕特蒙古对土默特蒙古进行了削弱措施，不过仍保留了基本的独立权。这只是反映当时青海土默特蒙古所处境遇的一个例子。而对土默特蒙古整体面貌，有待进一步细究。

和硕特蒙古对额尔克卫征的态度与上述楚呼尔的情况截然不同。据相关史料记载，额尔克卫征与和硕特汗廷的关系尤为密切，甚至他可能与和硕特蒙古贵族共享了同等待遇。《黄河南蒙古志》载有和硕特蒙古部分贵族和额尔克卫征统治西康地区的实际情况：“顾实汗消灭白利土司，占据西康地方后，派第五子伊勒都齐之长子罕都（看着洛桑丹羌）统兵镇守西康。后因势力太强，引起其他台吉的忌恨，借口看着洛桑丹羌违背祖训，从崇信格鲁派改信宁玛派之罪名，攻杀了看着洛桑丹羌。之后，名义上将康区的管理权移交给其弟达尔加・博硕克图济农管理。”[④] 博硕克图济农为首的和硕特蒙古贵族占领西康地区后，开始向当地部族收取贡赋。其中除罗卜藏丹津、厄尔德尼吉农（即察罕丹津）和墨尔根岱青之外，额尔克卫征亦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于此，同和硕特蒙古贵族共同管理西康地区。《黄河南蒙古志》记载：

> 《旧夥尔魏正台吉所属各部表》：嘛鲁族：一百七十二户，六百零九人。嘉庆时百长丹仲扎什，道光时索朗结吉。嘉庆时西藏委头人甘力都拉甘莽充。宁塔克族：十七户，四十九人；尼查尔族一户，二十九人；参嘛布马族：十七户，七十口。嘉庆百长彭措，道光时卓玛尔，嘉庆时西藏委头人甘卜。驻牧地色哩琼扎，东至鲁滚，南至勘尔根，西至扎麻噶，北至扎麻达。利松麻巴族：四十一户，一百八十一人，嘉庆时头人任进达尔吉，道光时策旺纳尔布，嘉庆时西藏委头人车令达尔吉。尼牙木查族：六十五户，三百一十五口……驻牧地木朱特，东至巴里素麻多，南至瓦舒，西至图克吉品。[⑤]

史料反映，在西康地区，额尔克卫征所属部众主要有嘛鲁族、宁塔克族、参嘛布马族、利松麻

---

① 仲优・昂青嘉布著，香札・尕布藏确吉坚赞整理：《先祖言教》，第 174 页。

② 赛赤洛桑丹贝尼玛：《赛赤洛桑丹贝尼玛文集》第 1 册，第 57 页。

③ 李保文：《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甘青川地区蒙古俺达汗后裔》，《四川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④ 卓仓・才让编著：《黄河南蒙古志》，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 年，第 81 页。

⑤ 卓仓・才让编著：《黄河南蒙古志》，第 84 页。

巴族等。在人数上略逊于和硕特蒙古贵族。[①] 不过，他在和硕特蒙古全面统治青藏高原时期能够有此殊遇，与其胞弟三世察罕诺们汗的宗教影响力不无关联。这一情形再次说明了和硕特蒙古对该家族给予了特殊关照。在 18 世纪初，拉藏汗与察罕丹津的博弈中，额尔克卫征的命运再度迎来了转变。《颇罗鼐传》记载：

> 藏王命其长子率领一千人马，开往黑河，同时，召其金字使嘎台吉和颇罗鼐起草调动卫藏大军的命令书……东方霍尔四部的百姓，不遵拉藏汗王法令，象扔掉枯树似地背弃汗王。他们拥戴蒙古王爷岱青苛雪齐（察罕丹津——引者）。为了惩处那群歹徒，并且绳之以法，拉藏汗王命令颇罗鼐公子和金子使拉孜·吉甫巴两人前往霍尔四部……随后启程上路，抵达喀喇乌苏（那曲——引者）……到半夜，全军突然包围霍尔四部的首领乌嗔台吉（卫征台吉——引者）那座象矗立在荒原上的黑塔似的帐篷……说道："你这暴君听着：因为你们不守古制，满肚狡诈，既不按时献上年贡，又不俯首听命，现在我等才率军而来。你们是服从命还令是违抗命令，尽管直说好了。如若不言，当即惩处。乌嗔台吉双膝跪地，两手抱拳，拜道："我们受一些蒙古王爷的欺骗，就像被水气濛濛的幻影所迷惑的野兽。今知过错，此后一定小心在意。除了汗王，誓不归服他人。现略备薄礼，以表悔意，恳请谅解。还望众位体谅边民，向那宽宏的王爷，代为禀明。"[②]

上述资料至少反映如下问题：其一，霍尔四部拥戴的是察罕丹津，证明霍尔四部在该时期是察罕丹津的附庸。拉藏汗继位后，他与青海左翼部分台吉形成联盟，而由扎西巴图尔和察罕丹津领导的右翼则掌管青海事务，这进一步加剧了和硕特蒙古内部的矛盾。和硕特诸台吉为争夺领土和属民的现象更加恶化。1711 年，拉藏汗又向康熙帝参奏察罕丹津掠夺车臣贝勒色布腾扎勒一事。[③]1712 年，拉藏汗听闻察罕丹津攻打的消息，自己率先出击，将霍尔四部收于囊中，而"察罕丹津是否真的出兵目前暂未发现相关记载"。[④] 从此，霍尔四部不再是察罕丹津的部众，转为听命于拉藏汗。霍尔四部被拉藏汗管控以及额尔克卫征的遭遇和结局，目前尚不可知。

其二，关于霍尔四部所指范围，《颇罗鼐传》给出的区域为：包括"藏北、青海东南、四川西北一带的蒙古部落"。[⑤] 这一记载应当符合史实。额尔克卫征与和硕特蒙古部分贵族一同管理西康地区，并有所属部众。1712 年，他以霍尔四部的首领身份出现于藏北地区，足迹遍及青海东南、四川西北及藏北地区。需注意的是，1714 年，青海蒙古部分贵族及罗布桑丹毕尼玛率拉莫德钦寺僧众赴拉卜楞寺听法时，土默特蒙古首领火落赤亦在场，[⑥] 表明土默特蒙古在原驻牧地仍保有一定独立权。而额尔克卫征则被和硕特蒙古所派遣，离开原驻牧地。这亦反映当时土默特蒙古的势力已逐渐分散，处于被动局面。

其三，和硕特蒙古对土默特蒙古采取了一些特殊方式来管理，即削弱土默特蒙古的势力，从而将其边缘化。尽管额尔克卫征被和硕特蒙古"特殊照顾"，但仍难逃被打压的命运。他在和拉藏汗的使者交谈中强调自己是边民，寻求拉藏汗的庇佑。这表明他身处"两难"境地，被夹在察罕丹津和拉藏汗之间，随时等待被掌管的命运。前述楚呼尔台吉的处境更糟，他被博硕克图济农掠夺部众之后，"试图摆脱博硕克图济农之控制，谋求自立"，[⑦] 但未能如愿。这说明在当时土默特蒙古处于相当严峻的处境。

---

① 卓仓·才让编著：《黄河南蒙古志》，第 82–83 页。
②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颇罗鼐传》，汤池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09–111 页。
③ 代琴：《察罕丹津生平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第 50 页。
④ 代琴：《察罕丹津生平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第 51 页。
⑤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颇罗鼐传》，第 460 页。
⑥ 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第一世嘉木样传》，第 148 页。
⑦ 李保文：《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甘青川地区蒙古俺达汗后裔》，《四川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除此之外，17 世纪藏文史料中的“霍尔”一词，值得关注探讨。在藏文史料中，“霍尔”一词频繁出现，表示北方游牧民族。“霍尔”一词的含义因时而异，“Hor 是否讲藏语并没有关系，在纯粹的藏族人（这个评价是主观的）看来 Hor 是异种族，而且他们的居住地是从西藏（中部）看以‘北’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①《黄河南蒙古志》所载“旧霍尔”和《颇罗鼐传》中的“霍尔四部”皆与额尔克卫征相关，表明“霍尔”在当时更多是指土默特蒙古。另外，17 世纪成书的《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多处提到“霍尔”，如记载 1632 年事迹中：“喀尔喀蒙古人击败了霍尔上部和雅弥格如，藏巴第悉为了抵御外侮，准备召集十三万户的军队与之对抗。”② 此处反映的史实为喀尔喀蒙古入侵青海地区并占领土默特蒙古驻牧地，更加明确“霍尔上部”即土默特蒙古。由此可见，尽管“霍尔”一词通常泛指蒙古，但在具体语境下，多指明朝中期迁入青海的土默特蒙古。

五、余论：青海土默特蒙古的历史归宿

和硕特蒙古控制土默特蒙古的策略以及察罕诺们汗的宗教影响力等因素，对青海土默特蒙古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面统治青海后，和硕特蒙古对土默特蒙古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其势力的措施，甚至不断地将其打压和边缘化。不过，仍为其保留了基本的独立权。在这个复杂的权力格局中，土默特蒙古贵族楚呼尔试图摆脱和硕特蒙古的统治，向康熙帝寻求庇佑，企图在政治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但未能如愿。额尔克卫征的处境虽然相对较好，但亦未能逃脱和硕特蒙古上层的压迫。在察罕丹津与拉藏汗的权力博弈中，他陷入了两难境地。这不失为当时青海土默特蒙古整体境遇的一个缩影。

然而，由于察罕诺们汗活佛系统在青海地区的影响力，自固始汗以来的和硕特蒙古上层一直扶持这一活佛系统。三世察罕诺们汗在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上，特别是在罗卜藏丹津企图侵犯察罕丹津时，将佛袈裟垫在地上，劝说罗卜藏丹津停止冒进。并且在罗卜藏丹津反清的过程中，他一度规劝其息兵讲和。这一行为赢得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赞许，因此，年羹尧在奏折中强调，“察罕诺们汗乃模样慈善之人”。③ 三世察罕诺们汗的积极表现，也为其在青海善后事宜中创造了有利条件。1725 年，清廷开始在青海地区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别有察罕诺们汗，授扎萨克喇嘛，辖四佐领，自为一旗，不列诸扎萨克盟。”④ 据此可知，清廷独设一旗供三世察罕诺们汗掌管，史称察罕诺们汗扎萨克喇嘛旗。这一结果，一方面同三世察罕诺们汗的宗教影响力有很大的关联，反而与其世俗身份关联不大；另一方面，其在罗卜藏丹津事件上的积极表现更加引起了清廷的好感。总而言之，额尔克卫征和三世察罕诺们汗的政教事迹中，可窥见部分土默特蒙古在明末清初的境遇及自入清以来的历史归宿。

References

Ruo song kuan. *Qingdai Menggu de lishi yu zongjiao*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Mongolia in the Qing Dynasty).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94.

Moriyasu Takao. “Zangyu shiliao zhong chuxian de beifang minzu DRU-GU he HOR”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DRU-GU and HOR appearing in Tibetan historical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Fan yaqiu, Bai yudong and Liu ziyang. In *Xiyu lishi yuyan yanjiu jikan*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① 森安孝夫：《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 DRU–GU 和 HOR》，范亚秋、白玉冬、刘子阳译，黄维忠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22 年第 2 辑（总第 18 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 年，第 300 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 89 页。

③ 季永海等编：《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61 页。

④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553 页。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2022, pp.

Li Wenjun. *Mingdai xihai Menggu yanjiu*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Xihai Mongolia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2008.

Li Wenshi. *Xichui gudi yu qiangzang wenhua* (Ancient western land and Qiang-Tibetan culture). Xining:Qinghai minzu chubanshe, 2001.

The Retreat and Final Abode of the Tümed Mongols in Qinghai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Γaldan Širegetü

BORJIGID Hu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uhe298@ruc.edu.cn)

Abstract: Lobšangdambinima (1689–1762), the Second Γaldan Širegetü, was one of the eight eminent Capital Lamas of the Qing dynasty, wield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ffairs during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His father, Erke Weiženg, was the elder brother of the Third Čaγan Nomunqan, who was revered as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Mongol and Tibetan tribes in Qinghai. This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reveals that Lobšangdambinima’s family descended from the Tümed Mongols, who had settled in Xihai since the mid-Ming dynasty. During their rule over Xihai, the Tümed Mongols primarily resided in the Mangla and Niegong regions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Qušuud Mongols migrated into the Tibetan Plateau, which constrained the Tümed Mongols and led to their retreat. However, the family regained prominence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religious authority of the Third Čaγan Nomunqan and his political stance during the Lobšangdanǰin incident, which earned him favor from the Qing court. In 1725,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league-banner system in Qinghai, granting the family an independent banner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Čaγan Nomunqan ǰašaγ Lama Banner. Thi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reveals the fate of the Tümed Mongols following thei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econd Γaldan Širegetü, Third Čaγan Nomunqan, Erke Weiženg, Qinghai Tümed Mongols